

站在潮头说大潮 ——首都30位经济学家话改革

薛小和

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新的改革浪潮。对此,日前在《改革》杂志主办的“如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讨论会上,首都30多位经济学家各抒己见。

徐雪寒、龚育之、李成瑞、周叔莲、童大林、江春泽、方生、吴象、吴明瑜、厉以宁、卫兴华、肖灼基、董辅弼、汪海波、赵人伟、罗肇鸿、何伟、臧志风、冒天启、马家驹、张卓元、唐丰义、钟朋荣、樊纲、朱铁臻、张文宝、方恭温等发了言。于光远、高尚全、杨启先、戴园晨、郭书田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蒋一苇、吴敬琏作为《改革》杂志的主编主持了会议。

经过12年的改革开放,在今天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经济学家们的头脑表现得异常冷静。从发言中可以看出共识:历史不是畅通无阻的大道,要把改革推向前进,必然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如果犹豫不决,固然迈不出步子,不作出巨大的努力去排除障碍,改革也会在行程中步履蹒跚。如果举措失当,即便有所前进,仍然难免遭受挫折。有鉴于此,他们把清理思想、坚定信念、明确方向、改善方法和规划实施列为当前经济学界急需要做的工作。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加快改革要以清理思想为先导。解放思想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贯穿于改革的始终。对“左”的思想理论的根深蒂固及其影响广度不能低估。从以往12年的经验看,没有改革初期的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没有进一步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已有的成果就难以巩固,更不可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只有思想进一步解放,僵滞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削弱,阻力才会减少,那些基本已经解决了的争论才不会反复发生,我们才能有足够的精力去推进改革。

讨论会指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右”的,更为主要是“左”的思想回潮已多次发生。理论上的混乱,往往导致改革开放在实践中徘徊不前,坐失良机。比如,有些有关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方针是已载入党的决议的,却被人更改,或者提出别的口号加以取代。又比如,有些人把在治理整顿期间必要的、暂时的上收权力、加强行政控制、扩大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也说成是改革。经济学家以大量实证材料说明,一些混淆视听的说法,把改革的概念弄乱了,使干部和群众莫之所从。不下大力气澄清某些人为造成的混乱,清理思想,端正方向,改革开放就不可能真正加快。

在讨论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专家们对

中国特色作了多种归纳,比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一国两制等等。有的学者认为,最大的特色是我们正确地、恰如其分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存在的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非公有制成分,包括资本主义成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管理方式和方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有些经济学家着重指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下述论断,即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出的这一基本选择,屏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集中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他们认为,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含义。

有的经济学家指出,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必须肯定改革是一场革命。就是说,改革决不只是一些细微的、日常性质的改变,而是在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对经济体制作出的革命性变革,以便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完成这一变革,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形成一整个历史阶段。只有这样认识改革的性质,才能有足够的魄力去实现经济体制的这种根本性的变革。

清理思想,清除障碍,最终是为了改革的深入,而改革是需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经济学家指出,1987~1988年期间,国家体改委还曾会同一批经济学家进行过中期改革规划的研讨工作,后来这项工作趋于停顿。近年来,理论界本应集中精力,设计改革的总体规划和分项改革的实施方案,但由于改革方向发生摇摆,工作很难进行下去。这样就出现一种危险,即在改革大规模出台的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具备,新的改革大潮即将到来的时候,却会因为胸无全局,失去领导和协调而陷于混乱,或者因为无法拿出能够据以施工的改革设计实施方案而增加实施中失误的可能,提高改革的成本。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有关部门必须负起规划、协调和指导的责任,提出整体设计,制定实施方案和新体制基本运行条件的准备等工作也应当抓紧进行。

在会上,经济学家为今后的改革出谋划策,提出了不少建议。例如,有的经济学家提出,需要组织引导若干

(下转第24页)

旧观点之间的戏剧性的冲突中,我们都认识到求理解的永恒的欲望,以及对于我们世界的和谐的坚定信念,都随着求理解的障碍的增长而不断地加强。

坚信自然界的和谐性,也就必然坚信科学的统一性,这是客观世界的本性在主观世界的反映。爱因斯坦把在世界图象中尽可能地寻求逻辑的统一看作是科学的目标,认为最高层次的科学理论就是具有可想象的最大统一性和最少的逻辑基础概念的理论。他对不具有统一性的理论感到无法容忍,而具有统一性的理论则激起了他的“壮丽的感觉”,并认为这样的理论才是“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理论的层次性时指出:科学理论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进化,“相当于为统一性而斗争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的几个阶段。对于终极目的来说,中间层次只有暂时的性质。它们终究要作为不相干的东西而消失掉”。爱因斯坦科学研究的一生,就是为谋求科学理论的统一性斗争的一生。从早年在《物理学杂志》发表第一篇科学论文“毛细管现象所得的推论”(追求分子引力和牛顿超距力的统一),到晚年潜心构造统一场论,他的研究工作无一不体现对统一性的追求。

4. 简单性。逻辑简单性原则,是爱因斯坦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也是他的坚定不移的科学信念之一,他把这项原则视为科学的目的和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之一(即“内在的完备”),尽管他认为要确切地表述它还有很大困难。

但是,科学中的逻辑简单性原则有没有客观基础呢?爱因斯坦相信自然规律的简单性具有一种客观的特征,它并非只是思维经济的结果。他说:“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界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的数学构造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他还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命题:“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爱因斯坦认为:“这个‘不可思议的信条’已由科学的发展给以惊人的支持。”

5. 因果性。对于因果性,爱因斯坦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把作为指向理论的一个公设的因果性和指向可观察量的一个公设的因果性区别开来。后者这一要求始终得不到满足——经验的因果性并不存在——而且以后还将仍然如此。我

认为,把因果性看成现在和将来之间时间上必然的序列,这样一种公式是太狭窄了。那只是因果律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在四维空间的世界里,因果性只是两个间断(breaks)之间的一种联系。……”爱因斯坦还指出,应当对量子论的成功感到羞愧,因为这种理论固然堂皇,但却认为电子有自由意志,上帝在掷骰子。他表示,情况果真如此,他宁愿做一个补鞋匠,或者甚至做一个赌场里的雇员,而不愿意做一个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的成功面前,依然不肯放弃严格的因果性,他说这是自己的科学本能。他指出:“我一如既往地坚信,把自然规律加以几率化,从更深邃的观点看来,是个歧途,尽管统计法获得了实际上的成功。”他认为:“理论的原则上的统计性,肯定不过是描述不完备的后果。”对于爱因斯坦的因果性信念,有人认为这是经典科学思想的残余,是机械决定论,它不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但是,谁又能完全肯定情况就是如此呢?

(责任编辑 孙立明)

(上接第22页)

项配套改革,安排好推进的先后次序。比如: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协调配套;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协调配套;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与自我约束机制改革协调配套。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在某些地区,应在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为重点的同时,把放宽政策,发展集体、个体和私营工、商、服务业作为迅速搞活经济的重要措施,这也是促使国营部门加快改革的良好办法。还有的经济学家要求迅速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股份有限公司法、会计法等基本法令和规章制度,保证市场经济体系有秩序地运转。

有的经济学家还论述了在改革新高潮中正确处理改革和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确保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需要在长时期中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但是,速度的提高必须建立在效益增进的基础上,否则是不能巩固的。而效益的提高,又主要依赖于改革的推进和新体制的有效运转。因此,应当牢记中共中央1985年在《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根据历史经验作出的结论:“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从当前来说,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改革的进行”。为了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不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不行的;但在新经济体制的框架还没有初步建立,从而效益还没有明显提高的时候,切忌用大量增加投入的办法,去盲目攀比和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经济生活的紧张和混乱,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以便在今后一个长时期中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高速度成长。

(转载自1992年4月4日《中华工商时报》)